

WESTERN CIVILIZATIONS

西方文明史 II

原著：[美] 罗伯特·E.勒纳 斯坦迪什·米查姆 爱德华·麦克纳尔·伯恩斯 译者：王觉非等

WESTERN CIVILIZATIONS

西方 文明史Ⅱ

原著：[美] 罗伯特·E.勒纳 斯坦迪什·米查姆 爱德华·麦克纳尔·伯恩斯

译者：王觉非等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文明史/[美]勒纳等著;王觉非等译.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3
ISBN 7-5006-4251-2

I. 西... II. ①勒... ②王... III. 世界史:文化史—高等学校—教材
IV. K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5935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 01—97—0051 号

COPYRIGHT NOTICE EXACTLY AS IN USA EDITION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by (Publisher's Company Nam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in association wit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 cyp. com. cn](http://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64034329 发行部电话: (010) 64065904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1/16 67.25 印张 40 插页 1100 千字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 8,001—11,000 套 定价: 148.00 元(I II 册)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84047104

雄狮书店: (010)84039659

近代早期的欧洲经济与社会

我们应该尊重和珍惜我们在偏僻或遥远国家里经营过的那些贸易，因为除了由此而促进了航运业和增大了海员人数之外，从那里往返运输的货物对帝国大有好处，远比我们附近的贸易有益得多。

——托马斯·曼：《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1630)

欧洲几乎每个国家的公民都分为三个等级：贵族、僧侣和平民……即便试图让所有的市民都享有平等权利和特权的柏拉图，也把他们分为管理者、士兵和劳动者三等。这一切都说明，即使用最通俗的词句来表述，没有一个国家(不论是真实存在的还是想象中的)其公民实际上能享有一切同等权利和特权。总是有人比其他人享有更多或更少的权利。

——让·博丹：《共和六书》(1570)

任何对近代早期欧洲社会的研究都必须注意它本身的变革，注意1600年以后两百年间足以促成法国革命的政治动乱的因素和导致工业革命的经济成因。可以认为，那个时期最彻底的变革是经济。始于十六世纪西班牙征服者进行海上掠夺的向海外扩张，到十八世纪后期随着欧洲成为庞大的世界贸易中心而告结束。这种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展的商业，产生了自己需要的机构，并改变了那些卷入商业大潮中的人的生活方式。银行和合股公司为国际商业投机事业提供资金。市场对产品的迫切需要使新的城市工厂应运而生。正当国际银行业发展成为非常成熟的行业，开业的银行家也都成了有权势的人。由于城市工厂实行新的工作条例，城市工匠即使不熟悉、不习惯，也得屈从于市场的需要。

经济变革

作为一个整体，欧洲已不能适应新的现实。在许多方面仍然按照中世

纪等级制为规范的民族社团——地主与农民，贵族与农奴，如今就不得不接受变革。每一等级理应承担其固有的义务和责任，犹如每一等级都理应有机的、天赐神授的社会整体的一部分。在这个预先注定的社会结构里，独立的商业企业家或被剥夺了一切的劳动者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地位？这类旧形式与新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总危机而进一步加剧，这个总危机我们在前一章已分析过。因经济异常扩展而产生的变革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十七世纪的欧洲大部分地区因平民和宗教骚乱闹得四分五裂，加上战争、疾病，气候一年好一年坏带来饥荒因而造成人口统计数字的波动和恶性循环。这就是与大部分欧洲人——仍然束缚于土地的男男女女——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变革。这些人，正如法国史学家彼埃尔·古贝尔所述，“死亡就在生活的中心，犹如墓地就在村子的中央一样。”这就是本章概括约二百年的一个时期产生变革的经济与社会状况以及促使变革复杂化和困难的习惯与传统。

一 生与死：人口的模式

在1600—1800这两百年间的欧洲历史中，最能说明其变革的程度的事实莫过于与生死攸关的人口模式了，因为它们在近代早期阶段自始至终都留下了痕迹。

饥荒的威胁

大多数欧洲人的生活模式都以为生存而奋斗为中心。他们靠最低的费用维持生活和工作，如果他们能养育子女或挣到钱足以幸存下来，他们就觉得自己十分幸运。在多数情况下，他们的敌人不是入侵之敌而是饥荒；无怪乎一个人富裕与否，仅可以用他的腰带来衡量。气候条件——通常是夏天长期的雨季——在十年里至少有一次造成严重歉收，从而带来广泛的营养不良，导致重病和死亡。一家人一时吃得少些还可以生存；但最后如果那少量的存粮吃光了，粮食价格高涨，生活费用就随之增长。那些几乎全靠草皮、干果和树皮代替粮食充饥的农民，不但吃不饱、营养不足，而且境况凄惨。

人口危机

普遍性粮食歉收不时间歇发生——以法国最为严重，每三十年出现一次(1597, 1630, 1662, 1694)。连续粮食歉收造成一系列的人口危机是近代早期人口统计史上的显著特点。歉收、粮食短缺引起粮价高涨不仅意味着人们营养不良和饥荒的可能，而且会导致失业增加：粮食收成少了，食品开支大了，制造产品的资金也就少了。这样的状况很容易孕育成对现状的失望，从而先后引起结婚和生育的延缓以致使人口下降。在地方教区登记本上反映出来的结婚和生育模式表明，全欧各个社区人口出现急剧升降

是随着农业的丰收歉收有节奏地波动的。

营养不足的人口特别易受疾病感染。淋巴腺鼠疫流行于十七世纪的欧洲。1649年在塞维利亚发生，1664年阿姆斯特丹，第二年在伦敦，这几次疫病发作十分严重。到1700年它几乎完全消失了；它最后一次在西欧出现是在法国南部一小块地区，年代为1720年，虽然迟至1771年在莫斯科还发生过一次。然而，尽管鼠疫逐渐平息，其他疾病却敲起了可怕的丧钟，因为当时人们可能得到的医药治疗比与全凭粗略猜测稍好一点，同时不管怎样，劳苦大众都是得不到治疗的。流行性痢疾、天花和伤寒发生更为频繁。迟至1779年，法国布列塔尼省死于痢疾的人超过十万。多数疾病不分贵贱地袭击富人和穷人。城乡吃水供应因随意排放的粪便、城市垃圾以及各种废物而受到污染。有一个时期，因为害怕传染病，每周一次的洗澡习惯也取消了，不管什么社会地位的家庭也都如此。塞缪尔·皮佩斯是十七世纪伦敦的一位富有的王室行政官，他在日记中记录他的女仆给他捉头上的虱子已成习惯，又说他生平第一次洗澡是在他妻子洗过之后，他这才体会到清洁的愉快。还有一次，他的女仆忘了给他安放便盆，他毫不犹豫就把卧室的壁炉当作厕所来使用。如果皮佩斯对卫生的态度是这样，那么挨饿受穷的农民以及种种不知不觉地影响健康的不讲卫生的做法就可想而知了。

朝不保夕的生活促使多数的男子和女子把婚期推迟得比亚洲和非洲传统社会晚得多。当时的欧洲男女都要等到自己真有足够的力量过活才肯冒险把自己的财产和别人结合在一起。这一特别的模式使女子平均到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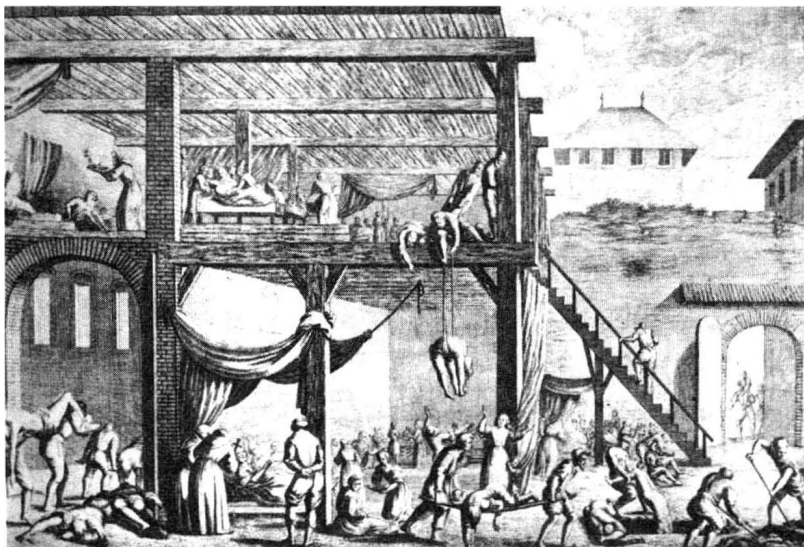
健康与卫生



夏季的乐趣：找臭虫。图中取笑当时日常生活中的的一件小事：捉到的臭虫当即在原盆中溺死。

欧洲结婚模式的意义

左图：维也纳鼠疫医院。鼠疫开始时先把病人集中到这样的医院，然后就地理葬死者，事后发现此法无效。右图：医生面罩。此系德意志防御鼠疫的用具，面罩上有勾鼻，内装鼻盐，当时医生错误地认为鼠疫是由有毒的烟雾传播的。



岁，男子二十七岁或二十八岁才能攒够维持成家的费用。青年夫妻全靠自己生活，不像在别的社会里他们是三代同堂中的延续的一房。因为儿子要到父死才能继承遗产，他就不得不自己独立成家，并把婚期推迟到他有能力成家才行。虽然史学家找不到解释这种晚婚模式的资料，但从青年男女方面来说，它可能是不断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准的结果。晚婚有助于控制出生率。一结了婚，一对夫妇通常在一年内生头一个孩子。虽然后来的孩子每隔一年至两年才生，但长时间的哺育会减低母亲的怀孕率，而社会上对婚外情的不满也多少限制了婴儿的出生率。

直至十八世纪中叶，人口的盛衰继续随着战争、饥荒和疾病的发生而波动。不过，大约从1750年以后，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经历了重大的发展，人口也随之显著地稳定增长。在俄国，领土的扩张使人口大为增长，到十八世纪后半叶，人口可能增长了三倍。其他地区的人口增长，虽然通常还不算显著，却十分重要。普鲁士人口增加了一倍；匈牙利则三倍多；英国1700年人口约五百五十万，1800年达到900万。1700年法国是欧洲人口最密的国家(约有二千万人)，在1790年之前又添了600万人。西班牙从1717年7600万人增至1797年10500万人。虽然人口增长的原因至今仍然是个谜，史学家大都趋于同意是食品供应大幅度逐渐增长使成年人和婴儿的死亡率二者都逐渐下降的积累结果。交通的改善便于把食品运输到更远的地方。开垦荒地，尤其是英格兰、普鲁士和俄罗斯那些开拓为殖民地的地区，



十八世纪的卫生。“夜工”在天黑之后走街串巷，倒各家各户的垃圾。

都为增产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新型的主食——土豆和玉米——补充了穷人的口粮。虽然这里提供的资料只是个片断，但它仍然表明：十七世纪欧洲的气候即使反常地恶劣，但后来的一百年大体是风调雨顺的。

人口的增长又带来了新问题和观念。例如，在法国，有更多农民努力在人口过密的农村里挣扎生存，这就给土地增加了压力。其结果就出现了从农村向城市移民。婴儿死亡率的降低——同时加上十八世纪末文盲的显著增多——造成穷人弃婴数字的增加。有的妇女不顾一切地杀害婴儿，即使孩子一出生得不到受洗就被害死，一般会被教会及社会看成滔天大罪。更为经常的是把婴儿遗弃在育婴堂的门前。正如捐助过几个这样的慈善机构的一位英国人乔纳斯·汉威在1766年所说，“出于良心和自我保护的需要，遗弃比杀害孩子的困难要少得多。”1780年代巴黎总共三万新生儿中有七千至八千个被遗弃。奇怪的是，有的史学家现在竟认为在这同一时期里，婴儿及儿童死亡率的下降鼓励许多父母采取不曾用过的办法过分小心和宠爱自己的孩子，因为眼看他们的子女一个个早死，使他们懂得感情无所寄托之苦。

虽然人口约有80%—90%住在农村小村社里，城镇却在近代早期欧洲生活中逐渐起重要作用。不过，欧洲大陆城市化的步伐差别很大，因此讲及城镇的“兴起”时，必须小心谨慎。俄国人几乎一直都是农村居民：1630年人口中只有2.5%住在城镇上，到1774年这个百分比才增加了0.5%。另一方面，荷兰1627年城市人口占59%，而1795年则为65%。

十六世纪末以后，城市居民总数的变化并不显著，当时欧洲人口超过一万的城镇不过二百个左右。1600年与1800年之间的变化，首先是城市在地图上的分布状况：他们集中在欧洲北部和西部发展起来；其次是非常大的城市在城市总数中所占的比例日益增长。这些变化与商业贸易的模式很有关系。1600年至1750年之间，大城市如德国的汉堡、英国的利物浦、法国的土伦、西班牙的加的斯扩大了250%左右。阿姆斯特丹，这个近代早期的国际商业中心，从1530年3万人发展到1630年115000人，到1800年则为20万人。那不勒斯，这个地中海的繁忙港口，人口从1600年的30万发展到十八世纪后期将近五十万人。在这里，有商品交易、加工和制造，建造船队，运载必需品，人们涌入寻找工作。十八世纪的一位评论家说，巴黎工人“几乎全是外地人”——这就是说，男女工人都是在市外出生的：木匠来自萨瓦，运水工人来自奥弗涅，搬运工来自里昂，石匠来自诺曼第，假发匠来自加斯科涅，鞋匠来自洛林。

商业发展变化的结果使一些城市扩大，另一些停滞或衰落。当毛纺制造业向北转移的时候，英国诺里奇的发展是以英吉利海峡沿岸的老工业中

新问题与新观念

城镇的“兴起”

城市人口的转移

城市发展的盛衰

行政管理中心的发展

心为牺牲的。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及其结束后，德意志的重要市场中心法兰克福的人口下降了，其原因就是频繁的军事行动导致通讯困难和普遍的社会不稳定，使该地原来大部分的商业转移到阿姆斯特丹。

在中央集权不断增强的欧洲国家里，它们的首都出现了人口猛增的势头。到十八世纪中叶，马德里、柏林和圣彼得堡，人口全都超过十万。伦敦从1700年的67万人到1800年增至86万人。巴黎，1600年约有十八万人，到1800年增至50万人以上。柏林，1661年有6500人，1724年为6万人到1783年则为14万人。该市扩大发展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因为后来的普鲁士统治者修建了通往布雷斯劳和汉堡的几条运河，从而改善了该市作为贸易中心的地位。它的人口同时也增加了，不过，那是因为普鲁士军队的显著扩大以及驻首都的官员人数增多之故。1783年柏林市民总数14万人当中约有六万五千人是国家雇员及其家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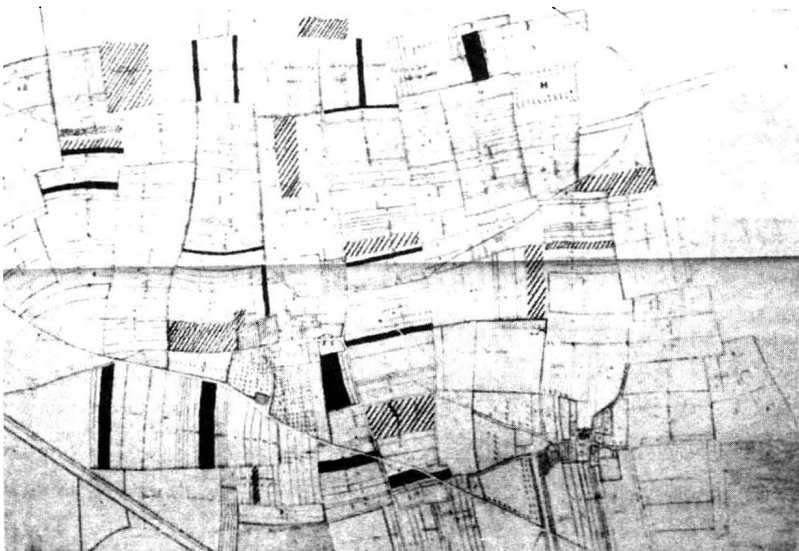
二 工业与农业的动力

传统技术让位于革新

我们探讨人口出现的急剧变化在某种情况下是促使工农业同样出现重大变革的原因，而在另一情况下则又是后者的结果。在我们探讨的这二百年的大多数时间里，农业生产普遍靠传统技术进行，因而产量一直低下，然而到十八世纪末，有的地区传统技术让位于革新，其结果是生产出现了迅速增长。

露地耕作

十七世纪欧洲大部分的农业区都由分散的露地组成。在欧洲北部，这些农田通常是大片土地分成狭窄的长条；在欧洲南部，一条条的农田反映出地貌很不规则的形状。即使一两个有钱的地主占有一个露地农庄的四分



1738年法国北部的露田制。注意图中大田块划分成狭窄长条，每条为不同的业主所有。

之三农田，他的地却不是一整块的。相反的，他的地是由许多小块农田组成，很少是互相邻接的，而是东一块、西一块散布在村子周围。这些地块一旦要使用，就使土地所有变得相当复杂。例如在法国，一个庄园主可能占有一组领地，它们的边界却与任何一个教区都连接不上。反过来一个教区又可能依靠不止一个庄园主。一位有产者的分散农田(即他和雇工一起为自己收益而耕种的田块)以及他佃户的农田(即他出租给农民的田块)全都由一点点小块地组成，而这些小地块又夹杂在属于其他地主(往往是小农场主)的小块农田之间。每一大块露地就像一条用布片缝缀起来的被子。在这种情况下，要有效地耕种土地，所有的“小块地”都得种同一种庄稼，以便同时播种、耕耘和收割。

由许多农民经营大量小块土地造成耕作效率低下是小农业主愿意付出的代价，以换取参与决定社区公共事业以及在公共土地上放牧牲口的权利。一旦地主开始以农业资本家的身份参与市场竞争，特别是在英国和荷兰，他们就会设法克服传统耕作的低效率，以便把他们的耕地产量提高。

参与决定社区公共事业

到十八世纪末，英国和荷兰有许多地方采用全面革新农业技术来解决低产的问题，其中最雷厉风行的一项是把露地圈起来，以便进行更有条理而更有成效的耕作。所谓“圈地”，就是在传统的村社内重新组织耕地。英国最早的圈地运动出现于十五、十六世纪，它限定把耕地用栅栏圈起来改作牧羊草地。由于羊毛的巨额收益，有的地主就把农民原来留作养羊的公共草地也圈为私有，这就威胁到社区全体农民的生计。

圈地

在那些实行产权绝对私有和雇佣劳动制的国家——以英国最为突出——圈地最容易实行。在具有“公共”放牧和收割饲料权利传统根深蒂固的地方，例如法国，地主要采取新的经济措施就会遇到更多的困难。还有，在法国，一大批农民自己占有全部的小块土地，加起来大约占全国耕地的三分之一。这些农民既没兴趣也没有经济力量去改变现状。君主倾向于反对圈地，因为圈地肯定会使与君主敌对的贵族阶级进一步致富。在十七世纪的法国，君主需要有经济上稳定的农民来维持不断增多的赋税计划，因此设法保证农民按老习惯租用他们的农田。有了这样的保障，农民就更有能力、更有效地反抗大地主发动的圈地运动。英国的地主比较幸运，他们利用克伦威尔时期王室不加干预的机会广泛地实行圈地。

产权绝对私有与公有相对立

不过，英国真正大规模的圈地运动是在近代早期阶段的末尾，亦即1710年至1810年之间进行的。当时地主开始参与“科学种田”的实践。他们认识到引进新品种和新的耕作方法之后，就可以减少休耕地，提高产量从而增加收入。地主试验重要的新品种是三叶草、苜蓿和豆科类植物。这些植物不如谷类作物那么需要土地的肥力，而且还能吸收氮和起松土作用，

科学种田

从而改进土质。有类似作用的另一新品种是萝卜。大力宣传推广种植这种蔬菜的人是查尔斯·汤森(1674—1738)，他是一位著名的贵族和政治家，因为在新的作物轮耕法中致力推广种萝卜，晚年获得“萝卜”·汤森的绰号。

三叶草、苜蓿和萝卜不仅有助于消灭休耕地，还为牲畜提供了上好的冬季饲料，从而促进更多更好的牲畜的发展。牲畜增多也就意味着粪肥的增加。因此，加强施肥就成了科学种田的农民另一种必须消灭休耕的途径。这时期引进改进农业的其他办法有：精耕细作、用播种机插播谷类作物。这就废除了过去用手撒播种子造成浪费的办法，因为落在地面上的许多种子会被鸟吃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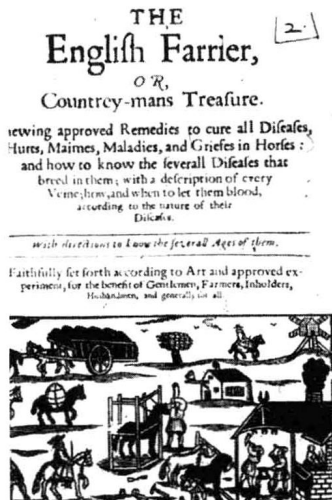
科学种田就需要圈地，因为“改进耕作”的地主要按自己的想法灵活地去作试验。他不可能不加栅栏自己种一长垄萝卜而其他农民却在他旁边所有的地里继续采用旧式轮耕。相反地，他得把自己的地块圈好，让人确知那是他的耕地无疑，这样才能进行最有效的实验，并使放牧时离群的牲口不能闯进去。由于三叶草一类的饲料作物的引进，大地主再也不需要公共放牧的草地，因为如今他可以在自己的地里放牧牲口；这样，他就更迫切需要把原来闲着的公共地块圈起来。

圈地是一场变革，凡是它出现的地方都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露田制的村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是公共性质的，大家一起决定种什么作物，连耕种地点和播种时间也一起商量。公有地不仅给穷人提供拴牛、钓鱼或打柴的场地，而且至少可以让人吸到一点社交自由的空气。圈地取消了村民这一点点的自由，连同帮助决定如何经营村社农作物的传统权利。村民(小土地所有者)和擅自占地定居的人世代代建立起使用公有地的习惯性权利。圈地一来，他们就被迫加入无地劳动者的行列。

在欧洲大陆，除荷兰之外，都没有类似英国的科学种田方面的进步。除西班牙这一重要例外，也都谈不上有像英国和低地国家那样雷厉风行的圈地运动。尽管如此，欧洲的粮食生产在十七八世纪却不断地资本主义化。地主把土地租给佃农，收实物地租。他们往往要佃农以作物收成的一半交租。这种实物地租在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最为流行。在东欧，如普鲁士、波兰、匈牙利和俄国，地主仍然继续依靠农奴无偿地耕种。但是，在改变了生产规模与销售方式来增加收益的地方，总会带动变革的苏醒。

十八世纪从美洲引进了两种作物：玉米(即玉蜀黍)和土豆，后来它们终于成为充分供应穷人的粮食。因为玉米只能种植在长期阳光充足、气候干旱的地区，它就得以在全意大利和欧洲大陆东南部广泛种植。一株谷物平均每穗只产四粒谷子，而一穗玉米可产七十或八十粒。这种“神奇”的作物把原来几乎空荡荡的粮仓一下子填满了。土豆同样地给北欧带来奇迹

圈地的社会影响



一种农业小册子的书名页。此书面向要求提高产量的资本主义农民发行。

引进玉米和土豆

般的革新。它的好处数之不尽：既可以种在土质最坏、含沙量最高或最潮湿连什么都不长的地里；亦宜于在最小块土地上耕种。在小块地上种土豆颇有好处，因为它的产量相当高。最后，它还改善膳食提供最廉价的食物。它含有丰富的热量、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北欧农民最初反对种植土豆和吃土豆。牧师教他们害怕这种作物因为《圣经》上没有提到过它。有人说它传播麻疯病。还有的人坚持说它会引起肠胃气胀，这是在1765年版的《法国大百科全书》中确认的病症，虽然该条目的作者还加了一句：“工人和农民都有健全的器官，得那一点点胀气算什么！”然而，在十八世纪期间，穷人渐渐适应了吃土豆，尽管有时是经受了相当的压力之后才适应的。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强迫农民种植土豆直至这种作物被人接受并成为德意志北部大部分地区的主食为止。到1800年左右，德意志北部农民平均每家每天至少吃一顿土豆为主食。

在近代早期欧洲的农村里，农业并不是惟一的商业性企业。制造品——特别是纺织品——在农村生产逐渐增多，与此同时，企业家却为防止对工匠和行会的限制措施（限制在城市制造业中的生产）而展开了斗争。毫无限制的农村工业，响应了由地方、国家及国际商业发展而造就的新市场日益增长的需要。企业家把这种市场需求称之为“分派生产制”，并利用它获得大量利润。在中世纪时代，行会种种规定限制纺织品的生产和分配以便稳定产品的价格。如今，不受行会规定的限制，商人可以买大批原料，往往是羊毛或麻，然后“分派”或供应农村工人去梳理（即梳理纤维）和纺线。纺好之后，棉纱或毛线又由商人收集再分送给织布工人织成布匹。然后，商人又把布匹转送其他工人在漂白作坊或染房里加工，最后由企业家收集起来，把布匹卖给批发商或直接出售给零售商。

农村制造业：分派生产制

虽然这一分派生产现象——或经常被称为“原始工业化”的加工——在全欧洲出现，它通常是集中在某些地区的。多数工业区专门生产某一种商品，是以便于获得原料为基础的。如佛兰德生产亚麻织品，韦尔维耶（在今比利时境内）生产毛织品，西里西亚生产亚麻织品。当地方、国家及国际性的市场发展起来时，这些在农村的制造业区也随之增多。企业雇佣了成千的家庭工人。在十八世纪中叶，法国阿布维尔有一家大纺织公司，雇佣了一千八百名工人在中心车间里干活，可是，另外雇佣在自己家里干活的工人竟有一万名。1786年奥地利林茨一家最大的毛织厂，雇佣了三万五千名工人，其中二万九千人以上是家庭纺线工。这些数字再次表明改革是近代早期阶段的标志。原始工业化，正如它的出现跨越一百多年，使阿布维尔和林茨在1780年大为改观，与1650年的样子大不相同。

地区生产专业化

农村工人接受这种生产制度是把它作为摆脱穷困或逃避严重歉收年代

家庭生产

可能出现的饥荒的一条出路。家庭纺织业牵涉到全家人。连最小的孩子也可以参加清洗生羊毛的工作。大一些的孩子则梳毛，丈夫和妻子纺纱或织布。在十八世纪末发明纺纱机(见下文 692 页)之前，纺纱的过程要比织布花更多的时间，由于十八世纪初英国人约翰·凯伊发明了飞梭，这个机械装置把梭子“抛”过织机后能自动回到起始位置，从此大大加快了织布的速度。

分派生产的好处

除提供额外收入外，这种分派生产制还给农村工人带来其他好处。他们可以适当调整劳动的进度，在耕种及收割农忙季节，他们可以把它完全放下。他们有事可以在家里工作是一件喜上加喜的好事，不过，农舍建筑简陋，通风往往很差，空气很闷，叫人不舒服，特别是工人不得不把庞大的织机设法安装在他们原来就很拥挤的住房里。但是，家庭作业尽管不愉快，却比离家到工厂去上班好，因为那里要受冷酷无情的工头监视，气氛也许甚至更压抑。这一制度对商人兼企业主也有好处，他们不仅不受行会种种限制，同时资本也不必绑死在昂贵的设备上(纺纱工通常自备纺纱机，织布工不是自备就是租用织布机)。政府亦欢迎这一制度的种种好处，把它看作解救农村老大难贫困问题的一个办法。1762年法国废除了城市制

左图：《庄稼人的求爱》。英国漫画家托马斯·罗兰森的蚀刻版画(1785)局部，描绘在门口操作的家庭工业的好处：有天然的照明，通风得到改善，并有机会与来客交谈。这种在自己规定进度的条件下工作，虽往往时间长、劳动艰苦，却可按自己的节奏进行。
右图：《工匠与家庭》。荷兰杰勒德·泰尔博赫。描绘十七世纪车轮修理工，虽是熟练工匠，却生活在贫困边缘。疾病、歉收、失业——任何一种都可轻易地把他连同家庭推进贫困的深渊。



造商的传统特权,使出于经济需要早就确立了的的生产制度即广泛实行不受限制的农村家庭作业得到法律承认。到那时,原始工业化不但流行于法国北部,同时也流行于英国东部及东北部、佛兰德、德意志北部大部分地区——所有这些实行农业和制造业混合经济的地区,都赋予了企业家和生产者以经济意识。

后来几代人,在缅怀历史回顾分派生产制时,又觉得它比后来取代它的工厂生产制好。不管怎样,在“家庭式经济”制度下,生活往往是艰苦的。虽然工人在某种程度上自行安排工作进度,他们仍然要满足小企业主的要求,而这些小企业主往往是缺乏经验的,他们对市场估计错误时,不是一下子加重纺织工人的工作量就是因缺订货而辞退他们。这个制度虽然经常使工人免于饥饿,却不大能使他们摆脱生活的单调和艰苦。有一首英国民谣,生动地反映出这些工人的生活压力。它写到织布工的妻子抱怨自己得洗衣、烤面包和挤牛奶,没有时间在纺纱机前坐下来干活时,她丈夫答道,不管怎样她都得“忙忙碌碌,把家务料理好/因为每当我们的活计需要人手/所有的事情都得放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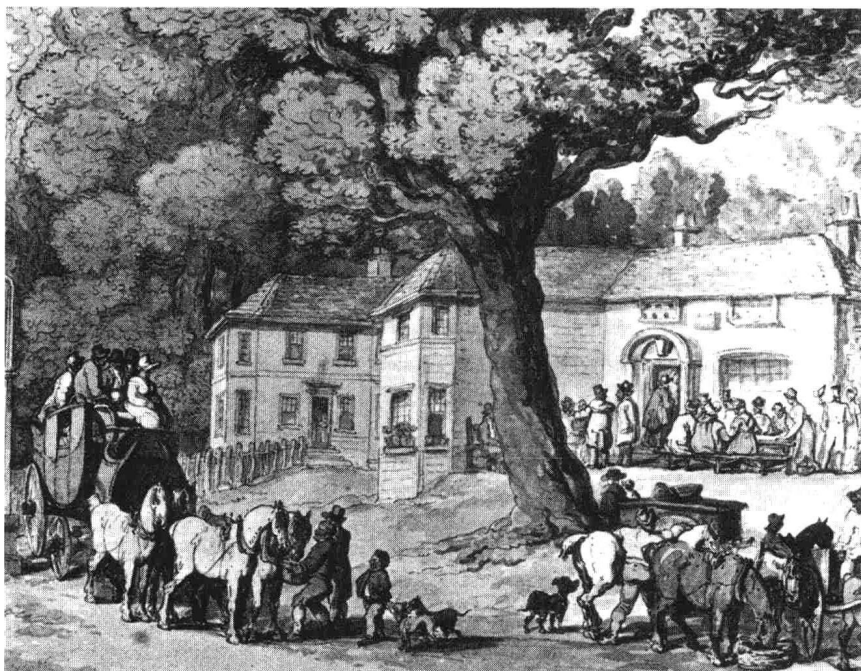
在家庭作业下的生活实质

纺织品并不是在农村生产的惟一工业品。例如在法国,在农村从事金属制造业的人和在城市的一样多,因为外来的工人给自给自给的小作坊提供了劳动力。在德意志许多地方,有同样不固定的家庭制造业基地盛行:如黑森林的钟表业和图林根的玩具业。从十六世纪中期到十七世纪后期,英国的铁产量增长了五倍。原始工业化的现象使原料供应的需求增加。对作燃料的储备木材的压力导致广泛砍伐树林,以及开采煤矿,尤其是在莱茵地区、英格兰和荷兰南部。1550年,英国开采煤达20万吨,到1800年,这一数字已增至300万吨。

农村其他制造业

尽管近代早期的运输系统仍然处于原始状态,农村工业却在繁荣。除极少数的例外,所有的道路几乎都是崎岖小道,到处坑坑洼洼,有的坑还足有4英尺深,一旦下雨,几乎全都不能通行,运货或载人的马车就会陷在深深的车辙里好几天。铺砌的道路只有几条,其中一条是从巴黎通往法国的主要内河港奥尔良,但那是极其罕见的。一般来说,没人能旅行一小时超过12英里——这是骑马送“快邮”一程的速度——而这样的速度还要在每一站里换马才能达到。在十七世纪后期,如果天气好,在好路上旅行60英里要24小时。从巴黎乘马车到里昂,大约250英里的距离就要花十天。商人要运输易破损的货物就得冒很大的风险。易破碎的货物运载超过15英里,就不能指望完整无损地到达目的地。沿海航运比陆运可靠得多,虽然二者都经常被超额的税收所左右。在1675年英国商人曾计算过,煤水运300英里比陆运15英里更便宜,因为在陆路上大宗运输是通不过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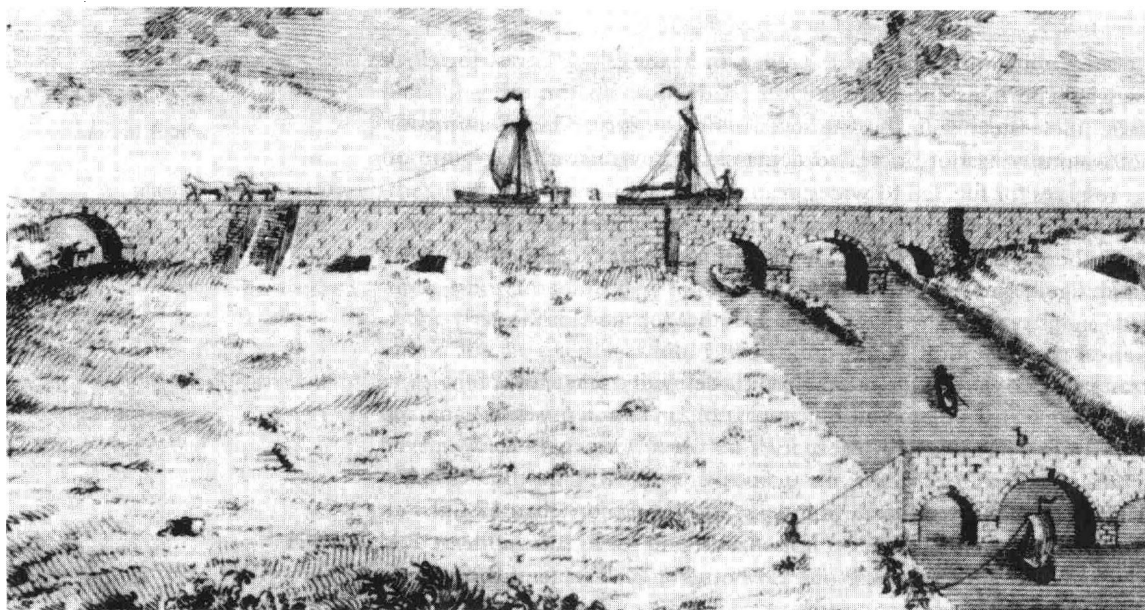
初步的交通系统



《道旁旅店》。托马斯·罗兰森。
 客车旅店把外界引进与世隔绝的村民生活。注意图中并无任何修筑好的道路。

马德里没有河，商品供应全凭驴拉二轮货车运送。到十八世纪中叶，该市运输用驴需要 50 万头以上，二轮货车 15 万辆，它们都得艰难地穿过崎岖的山路才能进城。1698 年，路易十四的铜像要从巴黎东南部的河港奥塞尔运到第戎城，运载货车出发不久就陷进泥里，铜像也就卸在路旁的棚屋里搁置了二十一年之久，直至后来道路修到了抛锚的地方才让它继续走完延期的旅程。

布里奇沃特运河



在十八世纪,交通运输渐渐地得到改善。1747年,法国人成立了道路桥梁土木工程师联合会并附设一所专门培训人才学校。于1670年间动工的一系列运河,这时终于把英吉利海峡与地中海贯通了。在英国,以资深运河建筑家布里奇沃特为首的私人投资者建造了一个水路公路相连的网络,沟通了各省的城镇,同时可达伦敦。随着公路的改善,就出现了驿站马车,起初人们怕它速度太快、怕它不安全,如同二十世纪初怕汽车一样。为了减轻几匹马拉车的重量,那时设计的马车都较窄小,因而引起乘客的不满。“如果偶或上来一个大腹便便或宽肩膀的旅客”,一位满心不高兴的乘客抱怨说,“你就得大发牢骚或者躲开。”但是,像驿车和运河这样的交通改善,即使能给富人增加大量收入或改变他们的生活模式,可对一般的欧洲人来说,却没有意义。有许多驳船定期往返于法国南北的水路上,但大多数的人出门都未超出他们附近的城镇市场,而且都是走小道或八英尺宽的崎岖二轮马车山道。这些道路既为他们的先辈服务亦为他们服务。

交通运输的改善

尽管运输效率低和种种弊病,工业却迅速发展这样的地步:它成为衡量欧洲日益增长的商业活力的标准。农村原始工业化并不妨碍城市重要制造业中心的发展。在法国北部,从事纺织业的男女工人有好几百万,在亚眠、里尔和兰斯那样的城市里生活和工作。十八世纪的普鲁士君主利用法国新教徒涌入的机会在柏林建立丝织工业,并制定政策使柏林发展成为制造业中心。不过,即便在城市里,活计似乎仍在小工场里做,由一个工头监督5个到20个工人制造他们本行的具体产品。这些制造业虽集中在家里和小工场里,但到1700年,随着许多小工场合并成为制造业区,这类工业就大量地发展起来。纺织业一马当先,其次是酿造和制酒业、肥皂及蜡烛制造业、制革业以及漂染化学原料制造业等等都发展起来。这些以及其他工业常常在城镇里或几个城镇的大区里集中雇佣几千名男女工人,他们全都是同一行业,从事同一种生产。

城市的制造业中心

有的工艺技术几百年也没有多大改变。有的则因为新的发明而改变了工作方式和产品的种类。在英国和荷兰,出现了加速纺织品制造的简单设备——编织机。铁丝拔丝机和切割机从德意志传入英国,后者便于制钉工人把铁条切成小段。在十七世纪,机械动力锯被引进了造船厂和全欧其他地区。印花技术,即在纺织品上直接印彩色图案的工艺,从远东引进。新型高效的印刷机首先在荷兰出现,然后传到别的地方。荷兰人又发明一种名为“起重浮箱”的机器,可以用它把船身从水里吊起来使之便于修理。

对机器与技术改进的响应

这类革新并不是马上就被工人接受的。省力的机器如机械锯使许多人失业。工匠们尤其是那些加入了行会的人,都天生保守,一心希望不仅保护他们那些严格的“权利”,同时还要使他们的手艺保密。还有,如果威胁

对新机器与新工艺的反动

到失业的增加，政府往往会出来干预，制止机器的广泛使用。以荷兰和德意志一些公国为例，他们禁止使用一种所谓“可恶的发明”，亦即可以同时织出16条以上缎带的织机。为了保护有势力的商业集团的利益和生存，有时新技术的传播会被政府卡住。为了维护家庭纺织业者和印度货物进口商，印花机有一阵在英法两国都明令禁止。巴黎、里昂等城市，还有几个德意志公国，也禁用靛蓝染料，因为它们是在海外制造的。

变革对人的影响

商业、贸易、工业、农业出现的变革虽是大规模的现象，它却直接影响到每一个人。圈地摒弃了已往习惯性的权利。到1780年，一个英国村民可能失去了他一家在公有地上拴牛那古老的权利，因为公有地也被圈起来变为“用科学”施肥的小麦田。市场发展成为向世界各地收集和输送货物的地方，这就改变了那些如今得把工作调节得适应市场节奏的人的生活。1700年在荷兰的一位亚麻织布工，他的父亲原是农民，在仅能维持生计的农田里好不容易才种出足以糊口的粮食，如今他另外为阿姆斯特丹的一个企业主工作，得到额外的收入，而且由于从东欧通过波罗的海输入低地国家的谷粮价格不断下降，他的粮食开支也就逐渐减少。十八世纪初，在土伦造船厂的一个木匠，因为雇主买了一把机械锯可以代替五个木匠的工作而失了业。一名水手乘土伦造船厂制造的船只出海，在法属殖民地马提尼克岛的海面上逝世，这个岛离他家乡那么遥远：不但他本人从来没听说过，就连事后几个月才接到噩耗为他吊丧的亲属也觉得不可思议。与此同时，东欧和南欧广大地区的男工女工仍然遵循着几世纪延续下来的方式生活，对别的地方出现的变革丝毫无动于衷。他们死抱着原来所知的生活不放，尽管艰苦，这种生活至少是可预料到的。

三 商业革命

资本主义的界定

与工农业变革齐头并进的是商业组织与贸易经营方法的变革。在两百多年的进程里，这些领域的变化幅度如此广泛，以致可以准确地把它称之为包括商业在内的革命。近代早期的工商业界不断发展受到资本主义和重商主义所支配。简言之，资本主义是一种生产、分配与交换的制度，其中积累的财富被私人用来投资以获取利润。它最重要的特点是私有企业、市场竞争和为赢利而经营。一般来说，它牵涉到如何支付工人劳动报酬的工资制，那就是支付报酬的方式不以工人创造财富的多少而以他们求职的竞争性强弱而定。资本主义代表对中世纪行会的半静态经济的一种直接挑战，在半静态经济里，生产与贸易——至少在理论上——是以有益于社会为指导的，服务报酬只收合理费用而不是无限制的利润。资本主义是实行鼓